

DOI: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5.0409

# 城市文化资本对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影响 ——基于北京市的实证研究

廖青虎<sup>1</sup>, 陈通<sup>2</sup>, 孙钰<sup>1</sup>

(1.天津商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天津 300134; 2.天津大学 管理与经济学部, 天津 300072)

**摘要:** 在测度城市文化资本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将城市文化资本作为一个虚拟变量引入到外生扩展的经济增长理论框架之下,利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模型及引入虚拟变量的空间滞后面板数据模型,以北京市17个区县2005—2011年的相关数据为样本,研讨城市文化资本和城市居民生活水平改善之间的相关关系,并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制度资本中,分离出城市文化资本对居民生活水平改善的影响作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表明:城市文化资本是影响居民生活水平改善的显著因素;引入虚拟变量的空间滞后面板数据模型回归结果表明:城市文化资本对居民生活水平改善的影响程度低于物质资本、制度资本,但是高于人力资本,而且,城市文化资本的水平越高,其对城市居民生活水平改善的推动作用就越大。

**关键词:** 城市文化资本; 单因素方差分析; 空间滞后面板数据模型; 居民生活水平

**中图分类号:** C912.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3370(2015)04-0067-06

## 一、问题的提出

经济学者通常将资本分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制度资本。1986年,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了“文化资本”的概念。文献表明,自布迪厄提出“文化资本”理论之后,关于“文化资本”的研究主要沿着3个方向:一是社会学的研究方向,学者们主要研究文化资本与个人学业成就、事业发展之间的关系。例如,Wildhagen(2009)<sup>[1]</sup>和 Jaeger(2009)<sup>[2]</sup>认为,通过激励、规范和惯性机制,文化资本对个人的学业成就具有显著的助推作用。仇立平(2011)<sup>[3]</sup>的实证分析证明,文化资本是社会下层人实现社会地位提升的最有效手段;二是着眼于文化产业。国内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比较多,例如,解学芳(2012)<sup>[4]</sup>从政府主体的层面对国外文化产业的发展战略进行总结和比较。张祖群(2013)<sup>[5]</sup>以文化资本的形成路径为基础,探讨北京市文化产业的发展路径。此外,马群杰(2009)<sup>[6]</sup>、牛宏宝(2010)<sup>[7]</sup>等也做过类似的研究;三是新增长理论和制度经济学为基础,探讨文化资本与经济发展、城市化之间的关系。国外方面,Vang(2007)<sup>[8]</sup>在新增长理论的框架下,探讨文化资本的溢出效应;Stern(1984)<sup>[9]</sup>研究了文化资本对费城房价的影响。国内方面,在 Bourdieu(2008)<sup>[10]</sup>、

Throsby(1999)<sup>[11]</sup>研究的基础上,张鸿雁(2002)<sup>[12]</sup>将文化资本的占用主体从“人”拓展到“城市”,提出了“城市文化资本”的概念。张鸿雁(2010)<sup>[13]</sup>提出,“城市文化资本”是城市再生产的场域空间,可实现城市的自我创造和自我更新,解决城市化进程中的环境危机、交通问题等。王小燕(2012)<sup>[14]</sup>也以为,城市文化是提升城市品牌、改善城市环境的最佳要素。基于文献梳理,笔者发现,一方面,还没有学者探讨过文化资本对社会经济资源空间配置的影响作用,而这个问题正是布迪厄将“资本”的概念引入社会学领域中,并提出“文化资本”概念的初衷之一:“文化资本是一种铭刻在事物客观性之上的力量,具有权利的形式,在特定的时刻,文化资本的不同类型或亚型的分布结构,在时间上体现为社会世界的内在结构……会影响社会世界中经济资源的空间配置”<sup>[15]</sup>。至于“文化资本”对社会经济资源空间配置影响的大小及机制,布迪厄没有给出,后续的研究也没有探讨。另一方面,“文化资本”的概念已经进入了城市经济学领域,但是,主流经济学家们在构建城市经济学模型时,通常将“文化”设定为“Ceteris Paribus”,“文化资本”对城市经济的影响作用没有从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制度资本中分离出来。

本文沿着“文化资本”研究的第三个方向,以张

收稿日期: 2013-12-14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71272148,171273186); 高校博士点基金资助项目(20120032110039)

作者简介: 廖青虎(1985—),男,讲师,E-mail:liaoqinghu@163.com; 陈通(1956—),男,教授,博士生导师,E-mail:ct88@tju.edu.cn; 孙钰(1965—),女,教授,博士生导师,E-mail:sunyuyao@163.com

鸿雁教授的研究为基础,探讨“城市文化资本”对城市社会经济资源空间配置的影响,因为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是城市社会经济资源空间配置的集中表现,所以,本文主要探讨城市文化资本对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影响。本文的创新点主要表现在:其一,拓宽了文化资本理论的研究方向,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模型,探讨城市文化资本和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相关关系;其二,运用引入虚拟变量的空间滞后面板数据模型,将城市文化资本对居民生活水平改善的影响从其他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制度资本)中分离出来。

## 二、城市文化资本的测度指标

文化资本的测度是一个难点,这是因为,文化价值的评估与人的主观判断息息相关,所以,很多经济学家都避而不谈文化资本的测度。从现有的文献来看,文化价值的测度方法主要有3种:索罗斯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和新西兰文化指标。索罗斯比(2003)<sup>[6]</sup>主张运用投资分析技术评估文化价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sup>[7]</sup>设计的文化测度评价指标包括4个一级指标(文化自由、文化创意成果、文化交流

和发展、生活预期)和11个二级指标。结合本国文化的具体情况,新西兰于2006年发布了《新西兰文化指标》<sup>[8]</sup>,包括5个一级指标(产业雇佣关系、文化同质发展以及文化多样发展等)和14个二级指标。以上3种方法对本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于城市文化资本的测度,Stern(2010)<sup>[9]</sup>提出,可以用城市文化资本外延形态的现实载体表示城市文化资本,从而可将城市文化资本与“主观判断”割裂开。根据Stern的观点,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新西兰的文化价值测度指标体系基础上,通过理论分析和专家咨询,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将城市文化资本分为5个系统:历史和人文资本、文化人才资本、文化创新资本、文化产品、居民文化价值观。具体来说,历史和人文资本包括3个二级指标;文化人才资本包括2个二级指标;文化创新资本包括2个二级指标;文化产品是文化产业的产出,所以,使用文化产业的相关数据测度文化产品的价值,用2个二级指标表示;居民文化价值观通过居民和政府的文化消费和文化支出得以体现,选用两个相对数指标进行衡量,具体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表1 城市文化资本的测度指标体系

1级指标	2级指标	指标来源
历史和人文资本	市级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目/个	文献[17]
	市级以上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个	
	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数量/个	
文化人才资本	市级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人的数量/个	文献[18]
	文化产业从业人员/人	
文化创新资本	大学科研机构的数量/个	文献[17]
	文化R&D投入金额/亿元	
文化产品	规模以上文化企业的数量/个	文献[18]
	文化产品的收入/亿元	
居民的文化价值观	人均文化消费占年消费支出比(居民的人均年文化消费支出/居民人均年消费支出)/% 群众文化事业、活动支出占比(群众文化事业活动支出/政府财政总支出)/%	笔者设定

## 三、模型构建和数据来源

### (一)模型构建

本文的模型构建分为两个部分。

#### 1.单因素方差分析模型

依据表1中城市文化资本测度的指标体系,通过聚类分析,本文首先将北京市17个区县(北京市内的16个区县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分为若干类。根据分类结果,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检验城市文化资本和居民生活水平改善的关系。在单因素方差分析前,本文需要做零假设 $H_0$ :北京市城市文化资本水平不同的区县居民消费水平指数均值是相等的( $\mu_1=\mu_2=\dots=\mu_k$ ),备择假设:北京市城市文化资本水平不同的区县

居民消费水平指数均值不等或不全相等。其中,居民消费水平指数=(报告期的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报告期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基期的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2005年为基期),代表居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单因素方差分析模型用以探讨城市文化资本是否为居民生活水平的显著影响因素,而具体影响作用的大小,需要通过引入虚拟变量的空间面板数据模型讨论。

#### 2.引入虚拟变量的空间面板数据模型

本文以Martin(1999)<sup>[20]</sup>提出的空间面板数据模型为基础,把城市文化资本作为一个虚拟变量引入到Mankiw(1992)<sup>[21]</sup>外生扩展的经济增长理论的框架中,构建一个引入虚拟变量的空间增长模型,并将城市文化资本对居民生活水平的的影响从其他因素

(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以及制度资本)中分离出来,比较不同水平的城市文化资本对居民生活水平影响的差异。空间面板数据模型为

$$PCIT_{it} = \beta_0 + \beta_1 GDPT_{it} + \beta_2 EDUT_{it} + \beta_3 PVT_{it} + \beta_4 D_{it}^1 + \dots + \beta_n D_{it}^n + u_{it} \quad (1)$$

其中,  $PCIT_{it}$  代表居民生活水平的改善, 用居民消费水平指数的增长率表示, 居民消费水平指数的计算公式同上;  $GDPT_{it}$  为物质资本变量, 用各区县 GDP 的年增长率表示;  $EDUT_{it}$  为人力资本变量, 用各区县本科以上学历人数的年增长率表示;  $PVT_{it}$  为制度资本变量, 用政府财政支出的年增长率表示, 历年数据使用消费价格指数平减;  $D_{it}^n$  为虚拟变量, 是由上文中的单因素方差分析模型计算而来, 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 如果城市文化资本是居民生活水平的改善的显著影响因素, 则对历年 17 个区县的分类情况赋值, 属于第类的区县,  $D_{it}^n$  取值为 1, 反之取值为 0;  $\beta_i$  为第  $i$  个因素对居民生活水平改善的贡献程度;  $n$  为虚拟变量的个数,  $u_{it}$  为随机干扰项。式(1)的空间模型包括空间滞后面板数据模型 (Spatial Lag Panel Data Model, SLPDM) 和空间误差面板数据模型 (Spatial Error Panel Data Model, SEPD), 具体采用的模型由数据检验结果而定。

在式(1)中引入空间滞后变量即为空间滞后面板数据模型, 其表达式为

$$PCIT_{it} = \beta_0 + \rho WPCI_{it} + \beta_1 GDPT_{it} + \beta_2 EDUT_{it} + \beta_3 PVT_{it} + \beta_4 D_{it}^1 + \dots + \beta_n D_{it}^n + u_{it} \quad (2)$$

其中,  $\rho$  为空间自回归系数;  $WPCI_{it}$  为空间滞后因变量;  $W$  为空间权重矩阵。

在式(1)中引入空间误差变量即为空间误差面板数据模型, 其表达式为

$$PCIT_{it} = \beta_0 + \beta_1 GDPT_{it} + \beta_2 EDUT_{it} + \beta_3 PVT_{it} + \beta_4 D_{it}^1 + \dots + \beta_n D_{it}^n + \varepsilon_{it} \quad (3)$$

$$\varepsilon_{it} = \lambda W\varepsilon_{it} + u_{it} \quad (4)$$

其中,  $W\varepsilon_{it}$  为空间滞后误差项;  $W$  为空间权重矩阵;  $\lambda$  为空间相关误差的系数。

## (二)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北京市 17 个区县的统计网站和《统计年鉴》。需要说明的有两点: 首先, 2010 年, 崇文区和东城区合并为新的东城区, 宣武区和西城区合并为新的西城区, 为保证样本的一致, 在数据的处理上, 2005—2010 年崇文区和东城区的数据相加为东城区数据, 宣武区和西城区的数据相加为西城区数据。其次, 表 1 中城市文化资本的测度涉及到文化产业的相关数据。2010 年以前, 北京市各区县统计年鉴中没有文化产业的统计数据。到目前为止, 北京市共有两次关于文化产业的界定。2006 年年底, 北京市出台了《北京市文化产业分类标准》, 将北京文化产业可以分为 9 类: 文化艺术, 新闻出版, 广播、电视、电影, 软件、网络及计算机服务, 广告会展, 艺术品交易, 设计服务, 旅游、休闲娱乐, 其他辅助服务。2012 年, 国家统计局又公布了新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标准(2012)》, 与 2006 年《标准》相比, 《标准(2012)》新增了“文化创意设计服务”, 将文化产业分为 10 个小类。根据以上两次《分类标准》, 考虑现有统计口径, 本文选取第三产业中与文化产业内容最吻合的两类产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数据, 代替文化产业数据。

##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 (一)北京市不同区县居民消费水平指数的单因素方差分析

#### 1. 北京市 17 个区县城市文化资本水平的聚类分析

根据表 1 中城市文化资本的评价指标, 利用 2005—2011 年北京市 17 个区县的相关数据, 本文采

表 2 2005—2011 年北京市 17 个区县的城市文化资本水平分类情况

聚类情况	地区分类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第一类地区	海淀、朝阳、西城、东城	海淀、朝阳、西城、东城	海淀、朝阳、西城、东城、石景山	海淀、朝阳、西城、东城、石景山	海淀、朝阳、西城、东城、石景山	海淀、朝阳、西城、东城、石景山	海淀、朝阳、西城、东城、石景山
第二类地区	石景山、丰台、经济技术开发区、通州、大兴、昌平、门头沟	石景山、丰台、经济技术开发区、通州、大兴、昌平、门头沟	丰台、经济技术开发区、通州、大兴、昌平、门头沟	丰台、经济技术开发区、通州、大兴、昌平	丰台、经济技术开发区、通州、大兴、昌平、门头沟	丰台、经济技术开发区、通州、大兴、昌平、门头沟	丰台、经济技术开发区、通州、大兴、昌平、门头沟
第三类地区	怀柔、房山、平谷、延庆、密云、顺义	怀柔、房山、平谷、延庆、密云、顺义	怀柔、房山、平谷、延庆、密云、顺义	门头沟、怀柔、房山、平谷、延庆、密云、顺义	怀柔、房山、平谷、延庆、密云、顺义	怀柔、房山、平谷、延庆、密云、顺义	怀柔、房山、平谷、延庆、密云、顺义

注: “第一类地区”代表北京市城市文化资本水平较高地区, “第二类地区”“第三类地区”表示城市文化资本水平良好和一般的地区。

用Q型系统聚类分析方法,运用SPSS 16.0软件,得到历年北京市17个区县的聚类情况,如表2所示(注:这里之所以要计算2005—2011年历年的聚类情况,是为模型2的分析做准备)。

根据表2的分类结果,下文将建立2005—2011年北京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单因素方差分析模型,探讨城市文化资本和居民生活水平改善之间的

相关关系。

2.北京市城市文化资本和居民生活水平改善的相关关系分析

结合上文模型(1)中的假设 $H_0$ 和 $H_1$ ,分析三类地区的居民生活水平是否有显著差异。首先,对不同年份的居民消费水平指数做方差齐次性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方差齐次性检验结果表

年份	Levene 统计量	自由度 1	自由度 2	显著度	年份	Levene 统计量	自由度 1	自由度 2	显著度
2005	0.148	2	14	0.863	2009	1.606	2	14	0.235
2006	1.119	2	14	0.354	2010	1.446	2	14	0.269
2007	0.414	2	14	0.669	2011	1.042	2	14	0.378
2008	2.746	2	14	0.109					

表4 居民消费水平单因素方差分析表

年份	误差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值	显著度	Eta 值
2005	组间	0.007	2	0.003	5.779	0.015
	组内	0.008	14	0.001		
	合计	0.015	16			
2006	组间	0.018	2	0.009	12.595	0.001
	组内	0.010	14	0.001		
	合计	0.028	16			
2007	组间	0.019	2	0.009	33.153	0.000
	组内	0.004	14	0.000		
	合计	0.023	16			
2008	组间	0.009	2	0.004	4.566	0.030
	组内	0.013	14	0.001		
	合计	0.022	16			
2009	组间	0.010	2	0.005	9.045	0.003
	组内	0.008	14	0.001		
	合计	0.018	16			
2010	组间	0.014	2	0.007	7.521	0.006
	组内	0.013	14	0.001		
	合计	0.027	16			
2011	组间	0.013	2	0.007	13.775	0.000
	组内	0.007	14	0.000		
	合计	0.020	16			

从表3可以看出,历年的伴随概率都大于0.05的显著性水平,满足方差齐性的条件,因此,可进一步计算统计量的观测值和P值,如表4所示。

表4中,历年的伴随概率都小与0.05的显著性水平,所以,三类地区的居民生活水平具有显著的差异,而且,2005—2011年城市文化资本和居民生活水平改善的相关程度也比较高(Eta值都大于0.5),由此可见,城市文化资本是影响居民生活水平改善的显著因素,二者具有一定的相关关系,至于城市文化资本对居民生活水平的的影响程度,单因素方差分析不能给出,下文将在单因素方差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引入虚拟变量的空间面板数据模型进一

步探讨这个问题。

## (二)引入虚拟变量的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分析

### 1.虚拟变量的引入

首先,需根据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在空间面板数据模型中引入虚拟变量。本文将表2中历年的第三类地区、第二类地区和第一类地区分别记为0、1、2,为了避免空间面板数据模型中出现共线性,本文以第三类地区作为基组,引入的两个虚拟变量分别为

$$D_{it}^2 = \begin{cases} 1 & \text{属于第一类地区的区县} \\ 0 & \text{其他} \end{cases}$$

$$D_{it}^1 = \begin{cases} 1 & \text{属于第二类地区的区县} \\ 0 & \text{其他} \end{cases} \quad (5)$$

## 2.空间相关性检验

其次,在进行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分析前,首先要做空间相关性检验,以验证北京市不同区县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是否具有空间相关性。Moran's I、LMerr、LMsar等都是针对横截面数据的空间相关性检验,为了使其可以运用在空间面板数据上,本文使用分块矩阵  $O=I_i \otimes W_N$  代替以上检验变量中的空间权重

矩阵,从而使以上统计量可以检验面板数据的相关性。而在模型估计时,鉴于MATLAB软件包允许数据在纵向和横向上分别输入,模型估计时仍采用空间邻接的权重矩阵,采用简单二分权重矩阵的方法,具体为:若两区县空间相邻,则  $W_{ij}=1$ ,反之,  $W_{ij}=0$ ,主对角线上的元素为0,经过行标准化处理后即为本文的空间权重矩阵  $W$ 。空间相关性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空间相关性检验

检验方法	Moran's	LMerr	LMsar	Lratios	Walds	LM-Lag	Robust LM-Lag	LM-error	Robust LM-error
统计值	2.312 8	14.802 7	13.019 0	23.875 2	42.975 1	35.072 8	16.752 9	28.404 0	5.864 7
P值	0.014 0	0.001 0	0.006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8 8

从表5可以看出:

1) Moran's I、LMerr、LMsar、Lratios以及Walds检验中,统计量的统计值都大于0,而且P值小于0.05的显著性水平,这表明,一方面,北京市不同区县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另一方面,空间面板数据模型比普通面板模型更适合于本文的研究,所以,本文应建立空间面板数据模型。

2) LM检验表明,SEM和SLM高度显著,而Robust LM检验表明,Robust LM-Lag的P值小于

Robust LM-error的P值,所以LM-Lag检验更显著,故本文选择使用空间滞后面板数据模型,表达式为

$$PCIT_{it} = \beta_0 + \rho WPCI_{it} + \beta_1 GDPT_{it} + \beta_2 EDUT_{it} + \beta_3 PVT_{it} + \beta_4 D_{it}^1 + \beta_5 D_{it}^2 + u_{it} \quad (6)$$

## 3.模型的参数估计

最后,本文采用极大似然估计(Maximum Likelihood, ML)的方法计算模型中的相关参数,具体结果如表6所示。

表6 引入虚拟变量的空间滞后面板数据模型回归结果

经济变量	C	$\rho$	GDPT	EDUT	PVT	$D_{it}^1$	$D_{it}^2$
系数	1.474 0	0.480 0	3.513 6	2.087 6	2.947 4	2.132 9	2.539 3
t-值	3.986 4*	9.360 0*	7.664 2*	3.558 4*	5.801 5*	3.894 2*	4.579 2*
R <sup>2</sup>	0.637 1						
L-L	-19.017 2						
Hausman	2.490 0(0.870 0)						

注:本表所列数据由matlab软件计算得到,\*表示1%的显著水平,Hausman检验()中的数值为概率。

根据表6,可以得出模型的最终表达式

$$PCIT_{it} = 1.474 + 0.48WPCI_{it} + 3.5136GDPT_{it} + 2.0876EDUT_{it} + 2.9474PVT_{it} + 2.1329D_{it}^1 + 2.5393D_{it}^2 + u_{it} \quad (7)$$

从表6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1)Hausman检验结果表明,模型不能拒绝随机效应。(2)城市文化资本对居民生活水平改善的影响显著,可以推动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其影响程度低于GDPT、PVT,高于EDUT。(3)在GDPT、PVT、EDUT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第一类地区的城市文化资本对居民生活水平改善的影响程度比第三类地区高2.5393,第二类地区比第三类地区高2.1329,由此可以推断,城市文化资本越高,对居民生活水平改善的推动作用就越大。

##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提出了城市文化资本的测度指标体系,并以北京市17个区县2005—2011年的面板数据为

样本,分别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模型和引入虚拟变量的空间滞后面板数据模型,探讨城市文化资本和城市居民生活水平之间的关系。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北京市城市文化资本是居民生活水平改善的显著影响因素。空间滞后面板数据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城市文化资本对居民生活水平改善的影响程度低于物质资本、制度资本,但是高于人力资本,而且,城市文化资本的水平越高,对城市居民生活水平改善的推动作用就越大。

从本文的研究结果看:

1. 城市文化资本是城市居民生活水平改善的一个支持变量,这对于物质资本薄弱或寻求转型发展的城市具有重大的启示,加大对城市文化资本的投资,实施“文化产业化,产业发展文化化”,科学扬弃,强化城市文化的个性和竞争力,通过创意、创新,合理地开发传统文化资源,并赋予它们新的时代意义和生命力,使“文化”成为改善城市民生的推动力。

2.城市文化资本对居民生活水平推动作用的大小与其“积累水平”成正比。由此可见,应树立文化的经济观,重视城市文化资本积累的“厚度”,从政策层面上,重视城市文化资本的长期积累性,提高城市文化政策的长期稳定性,避免因阶段性政策转

换而使城市文化政策出现“断层”,并建立健全的法律体系,形成监督和约束机制,避免“城市文化”的过度市场化取向和政绩取向所导致的某种偏离,实现城市文化资本的长期、可持续积累。

#### 参考文献:

- [1] Wildhagen T. Why does cultural capital matter for high school performance?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of teacher-selection and self-selection mechanisms as explanations of the cultural capital effect[J].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2009(50): 173-200.
- [2] Jaeger M. Equal access but unequal outcomes: cultural capital and educational choice in a meritocratic society[J]. *Social Forces*, 2009(87): 1943-971.
- [3] 仇立平,肖日葵. 文化资本与社会地位获得——基于上海市的实证研究[J]. *中国社会科学*, 2011(6): 121-135.
- [4] 解学芳,臧志彭. 政府主导的国外文化产业发展战略[J].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 14(4): 23-29.
- [5] 张祖群. 基于文化与科技融合的北京文化产业路径研究[J].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 15(4): 149-153.
- [6] 马群杰,汪明生. 经济演进趋势下的文化产业发展研究——以台湾台南为基础的分析与比较[J]. *公共管理学报*, 2009, 6(3): 84-91.
- [7] 牛宏宝. 文化资本与文化创意产业[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10(1): 145-153.
- [8] Vang J, Chaminade C. Cultural clusters, global-local linkages and spillovers: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nsights from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Toronto's film cluster[J]. *Industry and Innovation*, 2007, 14(4): 401-420.
- [9] Stern J, Seifert C. From creative economy to creative society[M]. Philadelphia: The Reinvestment Fund, 1984: 346-348.
- [10] Bourdieu P.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175-177.
- [11] Throsby D. Cultural capital[J]. *Journal of Cultural Economics*, 1999(23): 3-12.
- [12] 张鸿雁. 城市形象与城市文化资本论[M].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2: 96-98.
- [13] 张鸿雁. 城市文化资本论[M].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0: 79-81.
- [14] 王小燕,周建波. 城市品牌经济与市场环境的耦合状态评价[J]. *管理学报*, 2012, 9(1): 151-156.
- [15] 皮埃尔·布迪厄. 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113-115.
- [16] 戴维·索罗斯比. 文化经济学[M]. 张维伦等,译. 台北:典藏艺术家家庭出版社, 2003: 56-57.
- [17] McKinley T. Cultural indicators of development[EB/OL]. [2013-12-14]. <http://www.unesco.org>.
- [18] Ahurea T, Aotearoa M. Cultural indicators for New Zealand[EB/OL]. [2013-12-14]. <http://www.stats.govt.nz>.
- [19] Stern J, Seifert C. Cultural clusters: the implications of cultural assets agglomeration for neighborhood revitalization[J]. *Journal of Planning Education and Research*, 2010, 29(3): 262-279.
- [20] Martin P, Ottaviano P. Growing locations: industry location in a model of endogenous growth[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999(43): 281-302.
- [21] Mankiw N, Romer D, Weil D. A contribution to the empirical of economic growth[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2(107): 407-437.

## A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Urban Cultural Capital upon the Life Standard of Residents

### —Based on Empirical Research of Beijing

LIAO Qinghu<sup>1</sup>, CHEN Tong<sup>2</sup>, SUN Yu<sup>1</sup>

(1. School of Public Management, Tianj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 Tianjin 300134, China;

2. College of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Tianjin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2, China)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measuring the level of urban cultural capital development, the urban cultural capital is introduced into the framework of the exogenously expanding economic growth theory as a dummy variable. With the use of one-way ANOVA and introduction of Spatial Lag mode of dummy variable, taking the relevant data from 2005 to 2011 of seventeen districts and counties of Beijing as a research sample, this article explore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cultural capital and living standard of residents in urban area, then calculated the influence of cultural capital upon living standard of residents from material capital, manpower capital and social system capital. One-way ANOVA shows that: urban cultural capital is a significant factor which influences the living standard of residents, while spatial lag panel data model shows that: the extent of the influence is greater than the manpower capital but lesser than material capital and social system capital. Moreover, the higher the level of urban cultural capital is, the greater its effect in promoting the living standard of urban residents.

**Key words:** urban cultural capital; one-way ANOVA; spatial lag panel data model; living standard of residents

[责任编辑:宋宏]